

國學大師

叢書

趙樣初題



GUOXUEDASHI

顧頤剛評傳

(赣)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顾颉刚评传

作 者:顾 潮 顾 洪

特约审稿:刘起钊

特约编辑:陈世象

责任编辑:钱 宏

封面设计:彭开天 赵焜森

封面肖像木刻:颜 仲

版式设计:王玲云 芝 公

责任印制:罗时彪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中国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6.75 **插页:**0 **字数:**16 万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579—547—9/K · 13 定价:13.00 元(精)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学大师丛书》

总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侮，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赅,汲而易竭,其支绌天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腴,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

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四十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翼翼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一九九二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国学大师丛书》

重写近代 诸子春秋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 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辩、佛入中土、道教萌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

此视之，所谓“国学大师”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九十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 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即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路。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九十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

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 宏 (执笔)

一九九一年阳春节初稿

一九九二年立春节修定

序

刘起钎

——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当自己由于长期处于因循墨守的死气沉沉状态，经不起力求进取处于朝气状态中的外来文化的凌厉攻势，于是在迭次挨打之后，憬然感到自己文化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就有志士仁人起而力图挽救危亡，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寻觅各种自强的途径，启蒙人物前仆后继。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情况，正像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情况一样。

当时，最初在外来的坚船利炮对中国封建王朝的摧陷性打击之下，一些有识者力图更新自己、了解敌情，以经世济用，如魏源、龚自珍等既欲以经今文学之通经致用救经古文学墨守陈编之敝，又多方搜集了解西方情况之书于国人之前；而洋务派起而“师夷之长技”，尽量仿造各种机器技巧，但在文化上则坚持“中学为体”，只以“西学为用”；到改良主义运动起而戮力维新，不仅要在技艺方面“师夷长技”，而且

以为西方的文化学术、民主议会之制等也要学习,当时康有为鼓吹维新耸动天下,梁启超鼓吹革新的文章风靡一世,严复译西方几部名著,等于震聋启聩,才知西方学术、思想、政治、经济亦多优越;而遽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章炳麟,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他要把传统学术另行估定其价值。而所有这些先进人士,都是对传统学术功力甚深为人所共知的博学鸿词式的国学大师级人物。在他们的风气鼓荡之下,孕育出了又一国学大师级人物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正是出生于清季国势岌岌可危之际,传统封建文化正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而他的出生地苏州,又正是作为封建文化核心的清代汉学中心,又在长期受经学熏陶的家庭中成长,他自幼深所承受的封建学术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震撼,就使他很快承受上述一些先进人物的影响。他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世。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又在报上见到《国粹学报》的目录,……买了一个全份,翻读之下,始惊骇刘申叔、章太炎诸先生的博洽。”“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的学徒。”说明他最初承受新学说是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开始的。他在《玉渊潭忆往》一稿中说,梁启超可说是树立了一个从未有的批判态度,要把一切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价值,一种新时代意识就这样进入了自己的意识里。而章太炎学问范围比梁氏缩小,只要把古今学术思想估定其价值,专批判自己读过且较熟悉的古书,感受就较切较深。也就想步趋章氏,把古代学问作批判性整理。

到进了北大,正值蔡元培提倡学术自由,陈独秀宣扬新思想,使他有了打破旧思想的要求,及读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大胆提出传统古文经籍皆刘歆助王莽篡汉所伪造;而康氏《孔子改制考》首篇即指出上古茫昧无稽,就使他对自伏羲以来源远流长的古史

体系发生了怀疑。而使他整个思想意识起根本性飞跃的，则是震熠一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的反封建精神及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顾先生 1916 年进北大，毕业前一年爆发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在其前后几年都处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顾先生深受其激荡。由于素寝愤于封建经学及所孕育成的封建史学，就具备了条件入经学之室操经学之戈以反击此经学及所孕育之史学，于是顾先生就成为五四运动中站在史学领域里反封建传统的主将。

这样，一位以疑古辨伪擅名于学术界、创建了“古史辨学派”、开启新的史学之门的顾先生，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中国现代史上。而直接促成他完成这一伟业的，则是胡适、钱玄同二先生，以及与二先生共同讨论发现中国疑辨传统中代表人物郑樵、姚际恒、崔述诸人的辨伪著作。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说明了他在这学术专业上承受的主要渊源。

他的这一疑古辨伪业绩，划时代地把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力倡古史资料必须批判地对待，促成中国史学步入新时代，显出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科学领域所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有人只从当时顾先生之学盛行情况来加以描述，如徐旭生以为从 1917 年蔡元培掌北京大学时起的“三十年来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甚至说“当时大学几全被疑古派把持”（《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但更多的人则对顾先生学术内容学术成就加以评述。如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致顾先生集）。钱玄同亦称层累说“真是精当绝伦”（《古史辨》一册）。胡适说：“《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古史辨》二册）。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卓识。……他

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夏禹的问题》）。直至近年在国外学者如美匹兹堡大学许倬云说他们的研究工作“几乎无法避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古史辨》这部学术巨著的影响”（与西德吴素乐书）。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在史学界发生革命性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现代史学的观念。”“的确建立了孔恩（T. S. Kuhn）所谓的新‘典范’，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明确赞扬顾先生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这就最公正最鲜明地论定了顾先生学术的实质与价值，与前苏联历史学家越特金（Р. В. Бяткин）说顾先生之学“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致西德吴素乐信）完全一致。因此1987年6月22日北京英文《中国日报》评介拙著《顾颉刚先生学述》的专文《重新发现的历史学家》（Historian rediscovered, by Wu Mei 吴玫）一开头就说：“一位在六十年前曾给了二千年的旧的中国史学传统以毁灭性打击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当前学术重新认识本国文化之际，再度取得了他的声望。……顾颉刚……是国际承认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同时也受到数量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的研究。”

《中国日报》此文肯定了顾先生作为现代中国史学奠基人，是由于国际所承认，而且研究顾氏之学者日益增多。这是根据大量国外学者对顾先生学术的重视和研究所得来的认识。西德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ar）撰《〈古史辨〉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一文较详地搜集了有关资料，承她慷慨地借给我择要写入《顾颉刚先生学术》的“国外的影响”专节中。另外我还参考了美国施奈德（L. A. Schneider）《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所附注释，约略获知西方研究顾先生者不下四十余家，有论述逾百以上，主要论著达

七十余种。吴素乐文中则说：“西方关于评介新文化运动中顾先生及其学派学术的文献已经到了如此之多的地步，以致已不可能仔细查阅所有这些数以百计的论述古史辨学派在改革运动中所起作用的文章、专著和博士论文，因此只能略举一些最重要最流行的论著。”现在更概略地举一些较重要流行者谈谈，以见《中国日报》言之有据。（凡各家作者论文、著作原题及发表年月与出处，皆详载《顾颉刚先生学述》书中，此处皆从略）。

二十年代《古史辨》出版后，美国恒慕义(A. W. Hummel)谓其《自序》“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记载”。到1931年译成英文向世界传播，为西方学者不断引用，自三十年代直至近年都有引用者。

三十年代美国魏特夫(K. A. Wittfogel)称顾氏为中国起领导作用的史学家。英国莱恩(D. W. Lyon)称顾为“最受欢迎的作家”中的“有历史才智的学者”。美国埃伯哈德(W. Eberhard)谓顾“治学效用达到可惊地步”，以后常用顾的观点治汉学。又嘉德纳(C. S. Gardner)撰《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一书，大量引顾先生叙文，并谓顾虽用西方科学方法，却在纯粹的中国文化背景中钻研。又古德里奇(L. C. Goodrich)在哈佛刊物上英译顾论明代文字狱之文。

四十年代中期起至五十年代前期由于战争累乏了，对顾先生学术的研究沉寂下来。然其前其后略有数家介绍及显现顾先生观点之作。

六十年代初重印嘉德纳之书，使西方研究顾学重趋活跃。英国格雷(J. Gray)在《中国和日本历史学家》中撰写中国一章，介绍了古史辨学派的重要作用。美国沃克(D. M. Y. Kwok)撰文就科学观念进入中国谈顾氏这场历史论战。又施奈德英译顾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包华德(Howard Boorman)霍华德(R. C. Howard)合编《中国人名辞典》，列入《古史辨》二十三位作者小传。